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

阎书昌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传教士丁韪良出于借心理学来传播宗教的目的在 1898 年出版了《性学举隅》，这是融入了许多西方科学心理学知识的中文心理学著作。中国最早开设心理学课程的登州文会馆的两名毕业生在丁韪良撰写《性学举隅》过程中进行了笔述工作。丁韪良曾为益智书会撰写心理学教材但未完成，益智书会转而出版了颜永京的《心灵学》(上本)。以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为纽带，19 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进程中的几个重要事件构成了一副较完整的历史图景，反映出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与宗教传播有着密切联系。《性学举隅》吸收了当时西方心理学前沿性的生理心理学知识，向中国引介了催眠术和颅相学知识，并对中国的“五官说”、“七情说”进行了修正与补充，同时也借用了汉字的造字法来阐述其部分心理学观点。由于丁韪良向中国传播心理学是其宣传宗教思想的手段之一，而颜永京译述海文原著的《心灵学》更倾向于向中国传播心理学这一学科，强调了心理学与众多学科的联系和应用价值，因此丁韪良在心理学术语创制上的历史功绩要逊于颜永京。颜永京于 1882 年将 psychology 翻译为“心才学”，这是目前发现心理学学科的最早汉语翻译名称。

关键词 丁韪良；《性学举隅》；中国近代心理学；登州文会馆；颜永京

分类号 B84-09

1 引言

在华传教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于 1898 年出版了《性学举隅》，这是第一部融入了许多近代西方心理科学知识的中文心理学著作，此书虽曾在中国心理学界被提及过，并误以为 1904 年才问世(赵莉如，1991)，至今始终未见心理学界内对该书及其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进行过深入研究。1988~1989 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汪兴安在随荆其诚出访美国期间，在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发现了这本 1898 年版的《性学举隅》。目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着一份复印本(Jing & Fu, 2001; 汪兴安，个人访谈，2010-05-06)。在心理学界之外目前仅见《丁韪良与中国》一书中专设一节以 1904 版《性学举隅》为基础对其内容、特点、影响和意义进行了评述(王文兵，2008)，但是该著作对《性学举隅》的解读在

心理学理论和历史的视角上仍显薄弱，致使从心理学的视角对《性学举隅》的认识有待深化。本文在深入考察原著的基础上，以 19 世纪后半叶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传播为历史背景，试探讨这部心理学著作在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的历史价值，同时将它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梳理丁韪良及《性学举隅》与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几个重要事件或著作的关联性，以此来构建 19 世纪后半叶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图景，从而达到对中国心理学所走过的这一历程更为清晰的认识与理解的目的。

2 丁韪良与《性学举隅》

丁韪良，字冠西，1827 年出生于美国基督教世家。1846 年他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并在大学学习过精神哲学(又译“心理哲学”，Mental philosophy)课程。大学毕业后他进入神学院接受《圣经》方面的

收稿日期: 2010-05-10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09YJCXLX006)。

通讯作者: 阎书昌, E-mail: yanshuchang@126.com

培训,同时他也注重世俗科学(自然科学)在传教中的作用。1850年他抵达香港,开始了长达60多年的在华传教与传播西学的生涯。他曾介入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丁韪良主张世俗化传教,即以宣传基督教世俗文明来传播教义,因此他在华传教生涯也是其传播西方文化、世俗科学知识的一生。他曾开设崇实馆开展教育工作,翻译西方公法(国际法)、格致(自然科学)、政言国策(政治经济学)等大量著作。他于1865年任职于同文馆,其间出任同文馆总教习长达26年。1898年出任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参加了京师大学堂的早期筹备和开办工作。后曾出任湖北济美书堂总教习兼仕学院讲友。1916年丁韪良病逝于北京。作为传教士的丁韪良,他一直试图以基督教以及西方世俗科学来影响、改造中国,同时,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向西方传递了他的中国观和中国形象(王文兵,2008)。丁韪良是清朝末年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丁韪良虽曾涉足政治活动,但其活动主要还是传教、译书、教学等文化活动,他在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有过重要影响和历史贡献。

2.1 从“性理学”到“性学”

丁韪良笔下的“性理学”是衍自宋明哲学家“性理”之学的一个名称,它被作为一个宽泛意义上的哲学概念而被使用。丁韪良在《西学考略》(1883/2002)之中,在论述“各国学业所同”时称,相当于中国周朝末年,在西方“性理之学大兴,分门别户列为百家,交相论说,渐入虚无。惟素格底、布拉多、额利斯多(分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引者注)三人有圣贤之目……”,可见这三个哲学家在性理学领域有着重要作用。在介绍西方学校制度以及课程体系时,丁韪良提到了西方学校课程中有“性理”之学:“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灵,实原于天则天理,人性不可不究,况天地万物皆以一理维系,是西学之精微者莫如性理一门”。丁韪良(1883/2002)还称,“性理”之学往往是在书院中设置的课程,学习这门学问的人很多,但“明之者鲜”。在这里,“性理学”更接近哲学心理学的范畴。在《性学举隅》中他称“泰西性理家所论者……自不外天地人三才也”,不过,古代性理家“每以形而上者驰骛忘归”,近代则主要是“以究察人性为要”。可见“性理学”在古代和丁韪良所处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他又称以身体为研究对象的“体学为格物之一门”,以心灵为研究对象的“灵学”是“性理之大

端,以性学名之。”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丁韪良所使用的“性理学”并非专指心理学,只是指到了近代侧重于人性的哲学研究。对于“心理学”,丁韪良则使用了专门的术语,即“性学”,选自“性理”之“性”字为名。实际上用“性学”来指代探讨人类心灵的知识内容,并非丁韪良首创,早在1623年,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 Aleni)就用中文撰写了《性学述》一书,这是更早的一本中文哲学心理学著作,而且其撰写体例与《性学举隅》同为问答体。这两部著作虽时代相隔两个多世纪,但其中隐含着心理学概念以及相关知识的继承关系。

2.2 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图景中的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

丁韪良先是在《天道溯原》一书中阐发过人性问题,后以《性学发轫》为题撰写了二十多章这方面的论述并在《尚贤堂(新月)学报》上连载(王文兵,2008)。丁韪良在《性学发轫》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后出版了《性学举隅》。丁韪良的《性学举隅》一书能够将19世纪后半叶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几个重要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副较完整的历史图景。

传教士狄考文(C. W. Mateer)在山东登州文会馆较早开设了心理学课程。狄考文从1876年起,把当时的蒙养学堂改称文会馆,共设有正斋六年、备斋三年的课程。在正斋第六年的课程中,设有心灵学(即心理学)课程。狄考文发给1876年首届毕业生李青山等三人的文凭中即列有心灵学课程(韩同文,1993)。这是目前学术界所知道的心理学在中国教育系统中的最早开设(顾长声,1985)。狄考文与丁韪良交往甚密,丁韪良肯定对其开设心理学课程有所获知。丁韪良与狄考文同为美国长老会成员,又曾一起共事参加长老会活动,如1874年8月在山东烟台召开的美国长老会大会。他们二人都主张在中国办教育以促进基督教传播。1877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该委员会对外使用中文名字“益智书会”),丁韪良和狄考文同为该委员会的成员。丁韪良虽没有亲自参加这次大会,但是提交了《论世俗文学》一文,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精神与社会科学”(Mental and social sciences)对于传教的作用和价值,以及中国人的“性理”(Singli)之学(Martin, 1877/1881)。在丁韪良出版《性学举隅》之后,狄考文曾以“A new work on psychology”为题对这部心理学著作给予了较高的

评价(王文兵, 2008)。另外,《性学举隅》一书得到了登州文会馆两位毕业生罗善智、綦策鳌的帮助,他们二人协助丁韪良进行此书的笔述、润色工作,也正是因为二人在心理学方面有功底,仅仅“月圆两度,工已告竣”(丁韪良, 1898)。罗善智、綦策鳌(又名鸿奎)分别于 1886、1893 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韩同文, 1993)。丁韪良(1898)亦称:“綦、罗二君,夙擅格致、天算诸学,于性学尤易明晰,以为臂助,实称得力。此余既感激于天假之年,天假之地,又不能不感激于天之假我以人也。”可见,登州文会馆开设心理学课程间接地帮助了丁韪良顺利出版《性学举隅》。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成立之后决定编写初、高级两套中文教科书,这两套教科书中所列书目中有“心理哲学”(Mental Philosophy)科目。学校教科书委员会随后召开了几次会议,达成的决议中称凡是已经出版过相关书籍,或已经着手准备编写,或愿意承担编写教材任务的人都可以和教科书委员会联系相关教材的撰写事宜(韦廉臣, 1890)。很明显这是指有相关基础知识的人可以参与教材编写工作。而就编写心理哲学教科书而言,丁韪良和颜永京(1839~1898)都是合适人员。二人均在大学阶段学习过心理哲学课程,其中丁韪良还在多篇文章中或提及或阐发过相关知识。颜永京在 1857~1861 年就学于美国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在 1860 年秋或 1861 年春,他学习了约瑟·海文(Joseph Haven)的 Mental philosophy 课程。自 1879 年他在圣约翰书院开始边讲授边翻译海文著的《心理哲学》(Mental Philosophy)。颜永京于 1886 年参加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辑工作,并任该会委员(杨鑫辉, 赵莉如, 2000)。另外,颜永京曾将斯宾塞的《教育论》(Education)中第一篇文章“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知识?”(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翻译成中文,以《肄业要览》(1882)为名出版,该书中就涉及到了部分心理学知识以及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问题。而且在此书中,颜永京首次将 psychology 翻译为“心才学”,这是目前所知该词在汉语中最早的翻译名称。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写《心理哲学》的任务最初是安排由丁韪良来完成,他曾经致信教科书委员会称,正在着手撰写《心理哲学》和其他著作,但是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后来所出版的书籍中未见丁韪良的心理学著作(王文兵, 2008)。教科书委员会于 1889 年出版了颜永京的《心灵学》(上本)。丁韪良曾在《性学举隅》自序中提到,“自幼癖嗜性学”,

中西广泛涉猎,想写出一部中文著作,但是他就任同文馆时工作繁忙,忙于撰写“公法”、“格致”等书,一直未能如愿。从这里可以看出,丁韪良当时可能因为其他事情耽误了这部心理学著作的撰写工作,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转而出版了颜永京的译著。另外,丁韪良与颜永京同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而且他自己也曾致力于撰写心理学教材,因此他对颜永京出版《心灵学》以及该书的内容不可能一无所知。

丁韪良在中国开展或参与了许多教育活动,如 1864 年开办崇实馆,1865~1885 年任职于同文馆,1898 年出任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他主要参加了京师大学堂筹备阶段和开办阶段。京师大学堂曾因义和团运动而停办,其后于 1902 年开始复校,而丁韪良于 1902 年 2 月 17 日被解聘了。由于丁韪良深知西方学校中多设置心理学课程,如果他能够在京师大学堂继续任教的话,他肯定能为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中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这种由传教士所传播的心理学随着丁韪良的解聘而未能在他身上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世俗领域中中国近代心理学,也是西方心理学的世俗传播路径得以开启。西方心理学在明清时期传入中国都是经由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而撰写相关心理学著作开始的,如《西国记法》、《性学概述》、《灵言蠡勺》。作为传教士的丁韪良同样也是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而撰写了《性学举隅》,这是西方心理学在近代中国传播所走的宗教路径,而自 1900 年前后,西方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又出现了世俗路径,如康有为、梁启超对“心理学”一词的引入,王国维和一些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或欧洲心理学著作的译介以及心理学的教学活动(杨鑫辉, 赵莉如, 2000),尤其是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于 1902 年 9 月赴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其讲授课程之一为心理学。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教学活动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开展的肇始(阎书昌, 2009)。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世俗传播路径的开启,是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及其对心理学的需求密不可分的。西方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先是通过宗教路径,后通过世俗路径。在 20 世纪初的 20 多年间,这两条路径几乎是并存的,但世俗路径日趋成为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而宗教路径传播(主要是指传教士的相关著作以及教会学校内开设心理学课程)的作用逐渐式微。如在教会学校中一直使用的“心灵学”名称,至 20 世纪 20 年代

也相继改称“心理学”，课程设置也更多地体现出世俗领域中科学心理学的特征，如开设生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杨鑫辉，赵莉如，2000)，这应该是受到这一时期西方正处于心理学学派纷纷出现的影响，最终展示出科学取向心理学的学科体系。1898年版《性学举隅》中未见英文书名，丁韪良(1901/2010)在 *The lore of cathay* (《汉学菁华》)中提到此书时用的英文名字是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1904 年版本扉页的英文书名为 *Christian Psychology*(王文兵，2008)。这种英文书名的变化，反映出丁韪良可能认识到，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在中国已经日渐传播开来，而专以基督教心理学对此书进行命名，以示其与世俗世界中心理学体系的区别。由传教士在宗教领域中所传播的心理学，固然有其宗教的局限性，但是相关著作中所吸收的西方科学取向的心理学知识依然为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前期基础。

从这幅较完整的历史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三点：首先，19 世纪西方心理学的传入中国，是由传教士们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而开始在中国教育中传授的。其次，从心理学早期传入的几个事件来看，它们并非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相互关联的，反映着一种时代趋势。再次，近代心理学的传播始终是以教育为载体的，但是科学心理学的传播最终要脱离开宗教的影响，现代教育体制中心理学的传播和应用，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新起点。

2.3 《性学举隅》的内容与体系

该书由序言(包括李鸿章序、罗善智序和丁韪良自序)、总论以及上卷(共十五章)、下卷(共十四章)组成，1898 年初版，1904 年再版。该书为问答体，丁韪良(1898)声称这种体例可以深化学习，同时也能帮助读者培养思考问题的能力。“举隅”二字有“取其简而该(赅)，明而易晓”之意。此书目录如下：

总论；

卷上 论灵才。分别为论觉；论五官；论习觉；论悟；论记；论强记之术；论思；论思之三要；论思索致知；论以思索广实学；论象才；论思之限址；论梦；论梦行与行梦；论相脑。

卷下 论心德。分别为论欲；论情；论求好；论心之动；论是非心；论行之所本；论诸德；论心之主；论习；论修身；论物之灵性；论才德次第；论灵魂诸说；论天地来原(丁韪良，1898；下文凡引

用此书时不再注明)。

2.3.1 《性学举隅》的心理学体系

在“总论”部分，丁韪良首先提出“性理学”不外乎研究天、地、人，过去性理学主要注重对“形而上”的探讨，近代则注重研究人性。对人自身的探讨无外乎是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对自身的理解和认识包括两部分“曰身曰心是也，曰体曰魂是也，曰内曰外是也”。“体学”是研究人身体的生理学，而“性学”(即心理学)专门研究人的心灵。心灵与身体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心灵”对身体有统领作用，身体要受心灵的调动。心理学研究要先灵而后身体(这里的灵魂可以理解为人的主观世界)，其原因有三：一是“魂为我而身非我”，二是“我之悟我为人，其知由魂始也”，三是“魂之于身有贵贱之别”。

丁韪良的心理学体系分为两部分“灵才”和“心德”。灵才是指心理各种要素的功用，这些要素主要功用就是认识世界。“才”共分五类，即觉(感觉)、悟(自我意识)、记(记忆)、思(思维)和像(想像)，其功能划分为“觉、悟之职在取材，记、思、像之职，则将所取之材而成知”。心德是指人的道德修养。灵才主要是探讨人的各种心理机制，这些心理机制仅凭自身是不够的，还要有情欲，即人要有“所好”，“食、色、名、利等情”，也就是需要和动机。人的各种灵才与情欲还要靠“志”，“志为心之帅”，即意志的统领。丁韪良还称这个统领归根结底是“我”，其实是指人的意志。这些都是下卷“心德”的研究内容。“人以情欲下接物类，以是非之心，上接天神，以好善为鞭策，可期脱壳而跻于光明之域”，这就是丁韪良借心理学知识所要阐述的最终目标，即如何能做到修心养性，培养良好的基督教道德。虽然丁韪良的心理学框架是“灵才”和“心德”，并最终服务于基督教教义传播的目标，但是其中仍然涵盖了近代西方心理学“知”、“情”、“意”三分法的知识体系。

2.3.2 对生理心理学介绍

19 世纪中叶前后，西方生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实验科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生理学家的研究兴趣也进一步扩展到了心理学的领域，逐渐形成了介于生理学和心理学之间的生理心理学。丁韪良对西方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新进展相当熟悉，在《性学举隅》中进行了相当多的介绍，如论述了感觉的作用、传导机制以及感觉器官。如“心之所觉，知之本也”，心之觉“赖筋以外接而内达，则灵被警而觉似成矣”，即靠人的神经系统传导。

对视觉滞留效应的介绍：“木杆旋之极速，则视若轮矣”。神经冲动的电性质：“脑之生电，筋之通电，皆可验也。惟电之于觉悟关系若何，尚未确知。”对反应时的介绍：“觉虽极速，尚未能先后无间，必逾片时而觉”。对神经传导速率的介绍：“筋之通信，不及电线之捷。医家曾验其速，据云，肤被物触，由筋达脑，每秒不过行百余尺耳”。显然这是对赫尔姆霍兹神经传导速率研究的介绍。那个曾经激发巴甫洛夫发明瘰管技术的病例，也被丁韪良提及：“西国曾有人，战时胃经受伤而不收口，其饮食之酝酿融化，即能由疮口观之”。在西方生理心理学知识的基础上，丁韪良对感觉器官的结构及其机制的许多介绍都是比较科学的。例如，耳朵因有耳膜而能听到声音，在其介绍之中包含着某些听觉理论：“膜颤筋感而通于脑。颤速则声高，颤迟则声低”。目能视物是因有视网膜，即“目底铺有细筋，织成帐幔”。丁韪良在当时为中国传入了较多西方近代生理心理学方面的科学知识，为这些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2.3.3 对催眠术与颅相学的介绍

丁韪良对西方心理学发展史上的催眠术和颅相学进行了较详细地介绍和简评。催眠术和颅相学是丁韪良所处时代，也是西方现代心理学形成之前的两个“显学”。他称催眠术为“行梦”，称梦游为“梦行”。他首先对亲眼所看到的催眠术具体实施过程进行了介绍，并介绍了催眠术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人物美斯美(今多译为麦斯麦)和法国巴黎的著名医生沙尔格(今多译为沙科)，称沙科对催眠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阐发了其中的奥秘并“进而精之”。丁韪良认为沙科的重要贡献是他侧重于在催眠过程中对患者进行“授意”，使其醒来能够遵循之且不知缘由，以此来改变病人某方面的性情。丁韪良还提到催眠术并非人人都能学会，也并非人人都可以被催眠。同时他也提到了当时在西方催眠术被要求在公共场合实施，以避免催眠术被歪曲使用。总体而言，丁韪良对催眠术的介绍比较完整，介绍了催眠术的应用价值，如利用催眠术进行拔牙手术。他认为理解催眠术对于理解心理学有所助益。从目前来看，这是西方催眠术在中国最早的较完整介绍。

丁韪良称颅相学为“相脑”，并将其与中国的相面之术进行了一定的比较。在 19 世纪上半叶颅相学在欧洲相当盛行，其后随着对人脑科学认识的提高，颅相学逐渐衰微。颅相学的兴起是当时对

人脑及其功能初步认识的产物，丁韪良介绍了当时颅相学所依据的脑科学知识，尤其脑的功能分区概念，如“脑分三段，各有所专司”，还提到了“察知失语之怪病，在脑中有定所主之”，显然这里是指布罗卡于 1861 年提出言语运动中枢的损伤导致失语症这一科学发现。丁韪良讨论了“百年前出自德奥两国，遍行于欧美”的颅相学盛行转向衰微的原因，颅相学虽偶有正确的事例，但是终因其“狂妄过分”，“为害尤甚”而逐渐被人们所摒弃。

从丁韪良对催眠术和颅相学的介绍和评价来看，基本是科学而公允的。丁韪良在这里展现出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为这些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作为当时在中国有着广泛影响的一位传教士，其交往对象上至当时位高权重的文人，下至普通百姓，他所传播的科学知识必定产生更多的积极影响。

2.4 丁韪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理学思想的继承与修订

在对中国文化的继承方面，首先表现为丁韪良对“性理学”以及“性学”的使用上。“性理”一词离不开宋明性理之学的思想传统，丁韪良是借中国宋明性理学对人性的阐发而作为切入点的，进而将心理学命名为“性学”。从李鸿章为《性学举隅》所做的序言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联系：“丁君韪良笃学士也，旅华有年，于中西诸书无所不窥，而尤邃于性理，今先以性理之浅易者著为一编，题曰《性学举隅》。”(丁韪良，1898)。实际上，李鸿章在这里错误地把“性学”(心理学)视作浅显的“性理”之学的知识了。

丁韪良在介绍西方心理学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心理学思想，如认识论、情感论等进行了评述和修改(王文兵，2008)。如他针对中国文化中“耳司听，目司视，口司味，鼻司臭，心司思”的“五官”论，提出两个不足之处，一是“物之冷热燥湿等情，无专官以司之”，二是如果说“心”司职思考的话，它应该是统领五官，而不是并列其一。因此他建议：“删心补肤，与耳、目、口、鼻并列，则五官之数备，而心之位正矣”。同时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心作为思维器官是错误的，心脏是掌管血液流通的，脑才是人思维的器官。仅仅是由于语言习惯问题，中国人在提及“灵魂”(心理)时还往往用“心”这个字眼，但是“心与脑之各有所司，不可不辨”。另外，丁韪良还将“欲”从中国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的“七情”

论中分离出来,指出“欲”是身体内在的生理需要。从这里可以看出,丁韪良意识到“喜、怒、哀、乐、爱、恶”是个体受到来自外物的刺激产生的体验,而“欲”是源自自身的生理需求,并且会依照一定时间规律而被激发,从而修订了中国文化中“情欲”混而不分的观点。另外,丁韪良还对告子的“食色性也”说提出批评,认为“盖食色生之本,人畜皆同,畜之性以此为限,人之性则能结美德善果于无穷也”。在讨论梦时,他依据西方科学研究结果提出,梦是由于脑的自主运动所致,即“人之心思,醒时吾得主之,睡时则无意无悟,而脑自运动”。同时他还批评了中国文化中关于梦的许多迷信思想,如精魂外游、祖先显灵等。

我们不难看出,丁韪良凭借其丰富的西方科学知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带有思辨色彩的心理学思想做出了修订。他指出“他们(中国人—引者注)没有系统的心理学说,他们在这方面仅有的粗略尝试是逐一列举感官,也就是他们所谓的五官”。丁韪良称这是中国人缺乏分析能力所致,“尽管他们已经翱翔于本体论思考的九重天上,但他们几乎从未涉足自然哲学和抽象科学的领域。”(丁韪良,1901/2010)丁韪良的观点固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说中国文化中没有系统的心理学说,这一观点有其自身的和时代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他是以西方学术为参考标准来衡量的,如他称中国:“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语法的研究去考察语言的形式,也没有任何与我们的逻辑学相当的对推理过程的研究。”(丁韪良,1901/2010)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心理学界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一系列研究已经足以说明中国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的学说,并且这些心理学思想逐渐为当代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另外,丁韪良还多次运用汉字的造字法来阐述他的一些心理学观点,如他在解释“以言解意”的问题时,称汉字中“以‘音’配‘心’作‘意’字”,是指将“意”(意义)看做是“心”(即心灵)的声音。又如,丁韪良在阐述“悟”为“知我之为我也”时,称“造字者以‘吾’配‘心’作‘悟’字”,可能正是指把心灵或意识指向自身。丁韪良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汉字是中国劳动人民在对大自然、人自身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之后而创造出来的象形文字,某些汉字必定蕴含着当时中国人对某些心理现象的认识和观点。因此,汉字作为一种有着丰富心理学内涵的象形文字,其本身包含着一定的心理学思想,丁韪良

的思路对于中国文化中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

丁韪良向中国传播西方心理学知识是为其传播宗教而服务的,因此他尽可能地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为其印证基督教而服务(王文兵,2008)。如他将孟子的“恻隐之心”论、墨子的“兼爱”论等看作是基督教教义有相通之处,可以相互参照,而有些内容则需按照基督教进行补充完善。丁韪良创造性地以西方心理学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建立了一套以“事天”道德修养为中心的基督教心理学体系(王文兵,2008),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较科学的心理学知识。丁韪良在《性学举隅》中既有西方前沿性的心理科学知识,又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宣扬,如“心德”卷中的“是非心”、“诸德”、“修身”、“物之灵性”、“灵魂诸说”、“天地来原”等几章内,丁韪良将部分心理学知识用于宗教的宣扬。如果说心理科学知识在宗教在这部著作中存在一定矛盾性的话,这和丁韪良身份的多重性有关联。丁韪良在当时的中国既是一个传教布道者,又是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他有时表现出虔诚的传教士形象,有时又是一个拥有科学头脑的知识分子形象。丁韪良游走于宗教与世俗两个领域致使他的著作中存在着宗教与科学并存的现象。

3 《性学举隅》与《心灵学》之简要比较

3.1 著作性质与目的

与《性学举隅》能构成比较价值的同时代心理学著作是颜永京的译著《心灵学》(上本)。如前所述,丁韪良曾为益智书会撰写过心理学教科书,但最后未见他有这样的著作在益智书会出版,出版的却是颜永京的《心灵学》。《性学举隅》是丁韪良带有原创性的著作,这是他在西方心理学领域新进展的基础上独立撰写(当然他的著作经过了中国人的润色)完成的完整著作。而《心灵学》是颜永京译自海文的 *Mental Philosophy*。海文原著共有序言、绪论、第一编智能(Intellectual faculty)、第二编情感(Sensibilities)和第三编意志(Haven, 1858),而颜永京仅译出了原著的第一编“智能”,设为第一卷“论智”,再加上颜永京的自序就构成了《心灵学》上本的全部内容(颜永京,1889)。颜永京在《心灵学》中列举出心灵学(心理学)与宗教、医学、口才学(oratory,即演讲术)、肄业法(the art of education,

即教育的艺术)、个人兴趣、以及磨练人心都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说颜永京更侧重心理学的应用价值,而非单纯的传播宗教的作用。丁韪良的《性学举隅》,其下卷“心德”部分的宗教传播目的更为明显。

3.2 著作影响的比较

这两本书在当时中国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在当时,丁韪良与来自社会底层的教徒,以及清政府许多官员都有所接触,甚至还邀请到李鸿章为《性学举隅》写了一篇序文,无形中增加了这一著作影响的范围和深度。更为重要的丁韪良站在了中西学术交流和碰撞的潮头,吸收了大量西方科学的最新知识,顺应并促进了当时中国对西方科学知识吸收的趋势。而颜永京则是靠一己之力来完成这部《心灵学》上本的翻译,工作之艰辛致使他因身体不适而未能完成剩余内容的校辑和刊刻(马文驹,1984)。另外《心灵学》并非是严格的翻译,而是一种有删减的节译或者说意译,如他所说“将大略翻译汉文,教授后学”(颜永京,1889)。丁韪良《性学举隅》在当时出版之后,传教士狄考文、怀定(J. L. White)分别于1899年、1900年对此书进行了相关的评论(王文兵,2008),《万国公报》(1900)还刊印了《性学举隅》中李鸿章的序文和“总论”部分,编者并在文章后面加上按语,向读者推荐购买此书。相比之下,颜永京的著作影响要小得多,其术语影响也较小,阅读起来也很艰涩。海文原著中的“情感”和“意志”两编内容也因未能刊刻于世,成为一大遗憾,未能促使原著中所包含的一些科学知识在当时中国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不过《心灵学》出版之后,也受到了当时知识界的关注,被收录于1899年出版的《东西学书录》之中,著者称“西人论脑气作用之说,愈出愈精,大凡知觉为一纲,情欲为一纲,志决为一纲,是书但译智才一卷,余未之及。颜氏所译如此书及《肄业要览》,皆启悟童蒙善本。”(徐维则,1899/1902)可见时人比较注重《心灵学》在教育中的作用。《性学举隅》则收录于《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之中,与《心灵学》同列于“心灵学”名目之下。

3.3 心理学科学性的比较

在剔除了神学内容之后来比较《性学举隅》和《心灵学》的心理学知识,《性学举隅》中的心理学知识,有更强的科学性和实证性,而《心灵学》中的心理学知识,哲学倾向更为明显,更具思辨性。其主要原因在于《性学举隅》成书于19世纪

末,西方心理学已经确立起了学科地位,科学取向的心理学知识日益增多,许多心理学著作也相继出版,《性学举隅》对这些心理学知识吸收较多。而《心灵学》的原著 *Mental philosophy* 成书于19世纪50年代,西方心理学还处于哲学心理学阶段,近代科学知识还没有和哲学心理学相互融合起来。另外,丁韪良在阐述心理学知识时,具有较强的实证精神。他在提及一个心理学观点或理论时,经常会以“何以验之”来设问,然后再提供相应的证据或实验依据进行回答。同时他指出,“试验”(即实验)是西方实学盛行的原因,中国如果想大力发展实学,也应该以实验方法为重。丁韪良的这种实证精神,无论是对当时人们正确理解、运用心理学,还是对于其他学科的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3.4 “心理学”名称及心理学术语问题

对于心理学这门学科的名称而言,19世纪最后的20年间,在中国相继出现了四个名称:心才学(颜永京,1882)、心灵学(颜永京,1889)、性学(丁韪良,1898)、心理学(康有为,1898),其中心灵学和心理哲学的联系更为紧密。颜永京虽然是从海文著 *Mental Philosophy* 译出了《心灵学》,但是并不意味着颜永京不知道 psychology 一词与 mental philosophy 的关系。因为在海文原著中已经大量出现了 psychology 一词。海文所谓的 mental philosophy 其实就是 psychology,只是在当时 psychology 的名称还没有广泛被使用。海文原著之中已经明确提到“‘psychology’作为这样的一个术语现在正逐渐被人所使用”(J. Haven, 1858)。另外,如前所述,颜永京于1882年出版的《肄业要览》中曾经将 psychology 翻译为“心才学”。中国心理学界最终选择了接受“心理学”作为学科名称,而颜永京和丁韪良在宗教领域内分别使用的心理学学科名称“心灵学”、“性学”则逐渐被淘汰了,尽管“心灵学”作为心理学学科名称在宗教领域中又曾延续多年,但最终改称为“心理学”。在当代学科体系中仍存在“心灵学”、“心灵哲学”和“性学”等名称,但是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成为心理学之外的学科名称。对于汉语中接受“心理学”作为学科名称,钟年(2008)做出了较好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另外,清朝末年,中日文化交流十分紧密,日本学者此前曾利用汉字译制了大量西方学术名词在日语中使用,“心理学”就是其中一例。当时很多中国学者和留日学生对于这些词汇在汉语中的吸收和运用都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马西尼(1993/1997)认为,当从日本输入的汉语词汇与当时汉语语境中创制而且已经稳定下来的汉语新词发生冲突时,往往是前者被淘汰或者仅在很小范围内使用,而后者被汉语所接受。但是,无论是颜永京所使用的“心才学”,还是丁韪良所使用的“性学”来指代“心理学”,都没有达到在汉语中稳定地使用的程度,如颜永京创制的“心才学”,目前仅见他曾在《万国公报》发表《日使文学汇集·译序》中再次使用(颜永京,1893)。这是“心理学”作为日语词汇输入中国最终成为该学科名称的部分原因,而那些曾用来指代心理学学科的“心才学”、“心灵学”、“性学”等术语或者未被继承,或者成为其他学科的名称。

颜永京在独立译述《心灵学》过程中,创制了许多心理学译词,而且颜永京少用单字词,多用双字词,甚至还出现了多字词。固然颜永京所创制的许多术语都没有流传至今,但是他凭借一己之力在中国心理学术语的创制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丁韪良在《性学举隅》中也创设了一些心理学新术语,如梦行(即梦游)、行梦(即催眠)、相脑(即颅相学)、心君(即意志)、联属(即联结, association),但其著作中对心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以单字命名者居多,如觉(感觉)、悟(自我意识)、记(记忆)、思(思维)、像(想像)等,这反映出丁韪良在当时尽量用文言文汉字以及中国当时的语言习惯去表达心理学概念。虽然丁韪良很有可能知道颜永京的《心灵学》,而且自己的《性学举隅》比《心灵学》出版晚了近十年,但无论是心理学学科的名称,还是一些具体的术语,都看不出心理学术语方面明显的继承关系,目前仅能通过颜永京使用过“心才学”一词,而丁韪良曾使用过“灵才”一词,看到些许关联。这可能和丁韪良侧重通过传播让中国人能理解的心理学知识而最终达到传播宗教的目的有关。如前所述,颜永京侧重心理学的应用价值,而非单纯的服务于宗教的目的,又如他翻译出版的《肄业要览》中,就体现出他对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价值的认同。可以说,颜永京在心理学术语的创制上是为心理学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而服务的。故此颜永京在这方面比丁韪良有着更高的历史功绩,而丁韪良则囿于宗教传播的目的未能在这方面做出更多历史贡献。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丁韪良的《性学举隅》、颜永京的《心灵学》、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阎书昌,2009)组成了近代中国心理学早期发展史上

的三部重要著作。《性学举隅》和《心灵学》的著(译)者皆为传教士,具有一定的宗教背景,而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则是自1902年为京师大学堂授课而撰写的讲义,是面向中国教育实践的。《性学举隅》和《心理学讲义》都带有一定的创作性质,都融入了19世纪末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最新发展,而《心灵学》是19世纪中叶英文哲学心理学著作的汉译。同时,《心灵学》和《心理学讲义》均由译(著)者在中国早期大学内完成,与教学活动有紧密联系,而《性学举隅》则是出于丁韪良将心理学服务于宗教传播目的而完成的。这三部著作也分别反映着西方心理学早期向中国传播的三种形式:由美国学者直接传入、由中国学者翻译引介、以日本心理学界为桥梁而传入。在随后二三十年内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三种形式曾各自发挥着其历史作用。

4 结语

丁韪良以宗教传播为主要目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创作了一部心理学著作《性学举隅》,这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它代表着中国心理学所走过一个脚印。丁韪良出版《性学举隅》受益于登州文会馆两位毕业生的笔述工作。丁韪良曾为益智书会撰写心理学教科书但最终未能完成,益智书会转而出版了颜永京翻译的海文原著《心灵学》(上本),这些历史事件以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为纽带,构成了19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图景。《性学举隅》中所包含的心理学知识与体系,从其内容上来讲它沿承了19世纪中叶的一些西方哲学心理学,又涵盖了19世纪末西方心理学界内一些心理学学派、心理学分支的前沿性知识。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性学举隅》继中国第一本汉译心理学著作《心灵学》之后,开启20世纪初期西方科学取向心理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先河。尤其是丁韪良在《性学举隅》论述相应心理学知识的过程中,以实验或观察资料为证据,具有较强的实证精神,体现出心理学的学科性质,这对于当时及后来的中国知识界理解和发展心理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性学举隅》在为当时中国带来了许多西方最新的心理学理论与知识的同时,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有所修订和发展,丁韪良这种学术态度是基本公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代表着古代哲人在对某些心理现象思考过程中所曾达到的高度,其中不乏仍有现实意义的思想,例如丁韪良利用汉字造字法中

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阐发了中国文化对某些心理现象的认识, 对今天的中国文化心理学思想研究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性学举隅》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是应该被铭记的。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汪兴安老师对本文写作的鼓励和支持, 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参 考 文 献

- Chinese Globe Magazine. (1900). 136, 3-6.
[万国公报. (1900). 第136册, 3-6.]
- Ding, W. L. (1883/2002). *Xi Xue Kao Lue*.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Vol.1299).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丁韪良. (1883/2002). *西学考略*. 见 *续修四库全书*(1299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Ding, W. L. (1898). *Xing Xue Ju Yu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丁韪良. (1898). *性学举隅*. 上海: 美华书馆摆印.]
- Gu, C. S. (1985). The situation and influence of Shandong Tengchow College. In *From Robert Morrison to John Leightons Start*(pp. 285 - 294).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顾长声. (1985). 山东文会馆的情况及其影响. 见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来华传教士评传*(pp. 285-294).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Han, T. W. (1993). *Pedigree of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Qingdao: Printing house of Qingdao Training School.
- [韩同文. (1993). *广文校谱*. 青岛: 青岛师专印刷厂.]
- Haven, J. (1858). *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 Boston: Messrs Gould & Lincoln.
- Jing, Q. C., & Fu, X. L. (2001). Modern Chinese psychology: its indigenous roots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6(6), 408-418.
- Kang, Y. W. (1898). *The Bibliographies of Japan*. In Y. H. Jiang. (Ed). (1992). *The Complete Works of Kang Youwei* (Vol. 3).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康有为. (1898). *日本书目志*. 见 姜义华. (编校). (1992). *康有为全集*(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Martin, W. A. P. (1877/1881). Secular literature: viewed as missionary agency. In *The Chinese: Th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etters* (pp. 271 - 286).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 Martin, W. A. P. (1901/2010). *The Lore of Cathay* (Translated by H. Shen, et al.).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丁韪良. (1901/2010). *汉学菁华*沈弘 等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Ma, W. J. (1984). Several questions on the translated publications during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17(1), 39-46.
- [马文驹. (1984). 清末民初心理学译著出版中的若干问题.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7(1), 39-46.]
- Masini, F. (1993/1997).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Translated by H. Q. Huang). Shanghai: Publishing House of an Unabridged Chinese Dictionary.
- [马西尼. (1993/1997).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 (黄河清 译).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Wang, W. B. (2008). *Ding Weiliang and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王文兵. (2008). *丁韪良与中国*.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Williamson, A. (1890). Reports of 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 In X. X. Chen. (1987). *Teaching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Education* (Vol. three, pp. 33-37).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 [韦廉臣. (1890).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报告. 见 陈学恂. (1987).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 (pp. 33-37),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Xu, W. Z. (1899/1902). *Dong Xi Xue Shu Lu* (Enlarged edition). In Y. Z. Xiong. (Ed). (2007). *Bibliography Abstract of New Lear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徐维则. (1899/1902), *增版东西学书录*, 见 熊月之. (主编). (2007). *晚清新学书目提要*.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 Yan, S. C. (2009). On Hattori Unokichi's *Teaching materials of psychology*.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1(5), 464-470.
- [阎书昌. (2009). 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 *心理学报*, 41(5), 464-470.]
- Yan, Y. J. (1882). *Yi Ye Yao L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by Spencer). In J. D. Yuan. (Ed). (1901). *The Sequel of the Fu Qiang Zhai Series*(Vol. 30). Published by Xiao Cang Shan Fang.
- [颜永京. (1882). *肄业要览* (史本守 撰), 见 袁俊德. (辑). (1901). *富强斋丛书续集* (第卅册). 小仓山房校印.]
- Yan, Y. J. (1889). *Xin Ling Xue* (the first volume). Shanghai: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 (*Yi Zhi Shu Hui*).
- [颜永京. (1889). *心灵学* (上本). 上海: 益智书会.]
- Yan, Y. J. (1893). Preface of translation of the collections on Japanese ambassador' letters. *Chinese Globe Magazine*, 50, 5-7.
- [颜永京. (1893). 日使文学汇集译序. *万国公报*, 第50次, 5-7.]
- Yang, X. H., & Zhao, L. R. (Eds). (2000).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Psychology*.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al Press.
- [杨鑫辉, 赵莉如. (主编). (2000).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Zhao, L. R. (1991). Early relations and exchange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China and Japa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4(2), 88-96.
- [赵莉如. (1991). 中日心理学史上的早期联系与交流. *心理学报*, 24(2), 88-96.]
- Zhong, N. (2008). "Mind" and "psycholog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0(6), 748-756.
- [钟年. (2008). 中文语境下的“心理”和“心理学”. *心理学报*, 40(6), 748-756.]

Ding Weiliang and His *Xing Xue Ju Yu*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sychology

YAN Shu-Chang

(School of Educ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Xing Xue Ju Yu 性学举隅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was written by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Ding Weiliang (W. A. P. Martin). As one of the earliest books on psychology written in Chinese, it was published in 1898. This book contains three prefaces written by Qing premier Li Hongzhang, Luo Shanzhi and Ding, which was written in a form of question and answer. It contains a brief outline, with fifteen chapters in the first volume named *Ling Cai* 灵才, and fourteen chapters in the second volume named *Xin De* 心德. In this publication on psychology, Ding introduced the state-of-the-art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in the West, largely in the field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along with some psychological theories, such as hypnotism and phrenology.

Ding and his *Xing Xue Ju Yu* were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sychology in China. His works on psychology and other related persons and events constructed a historical sket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psychology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19th century. The completion of *Xing Xue Ju Yu* was benefited from Luo Shanzhi and Ji Ce'ao, both of whom graduated from Tengchow College. The college was founded by Di Kaowen (C. W. Mateer) and was the earliest school to offer courses on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courses (named as *Xin Ling Xue* 心灵学 in Chinese) were introduced in Tengchow College in 1876. With abundant knowledge in psychology, the two graduates were successful in helping Ding to complete this psychological text written in Chinese. Ding greatly appreciated their work of embellishment.

Ding was prepared to write a textbook on psychology for 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 (Chinese name was *Yi Zhi Shu Hui* 益智书会), which was founded in Shanghai in May 1877 on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owever, his other heavy translating works hindered its completion. The first volume of *Xin Ling Xue* translated by Yan Yongjing from Joseph Haven's *Mental Philosophy* was published by 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 in 1889. Both Ding and Yan wer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Thus, it is likely that Ding knew about Yan's publication and even its contents. From this historical view,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psychology relied on the diffusion of religion.

Although Ding was appointed president of *Jing Shi Da Xue Tang* (former of Peking University), he did not directly prompt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in this school. It was Hattori Unokichi who initially passed on knowledge in psychology in higher level education in China. He was a Japanese scholar who taught in *Jing Shi Da Xue Tang* since 1902. It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modern Chinese psychology.

Although Yan's *Xin Ling Xue* was published earlier than Ding's *Xing Xue Ju Yu*, there does not seem to be any sign showing the former influencing the latter. This could be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goals of the two men. Ding attempted to diffuse his religious thoughts by the means of introducing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to Chinese. On the contrary, Yan wanted to introduce psychology to China, and emphasize the value of psychology in various fields. In order to introduce this discipline, Yan worked hard to create many psychological terms in Chinese. For Ding, in order for Chinese to understand psychology more easily, he always used indigenous Chinese language to translate psychological concepts and theories. At the same time, Ding modified some psychological though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when he utilized the psychological thoughts embodi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to convey his psychological ideas. In addition, Yan Yongjing officially translated the word "psychology" into "*Xin Cai Xue*" 心才学 in 1882. This was the earlie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word to be found.

Key words Ding Weiliang (W. A. P. Martin); *Xing Xue Ju Yu*; Chinese modern psychology; Tengchow College; Yan Yongjing